論　著

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

游　鑑　明**

摘　要

第二次中日戰爭帶給中國人的浩劫與苦難，是許多中國人的共同記憶。為對女性的戰爭經歷做較完整的探究，本文選擇名不見經傳的知識女性范小梵的回憶錄《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進行深度研究，由於這本回憶錄是從日記整理而出，難免會有時空交錯的著

* 本文初稿原發表於2012年12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戰爭、記憶與性別」工作坊，感謝評論人孫慧敏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寶貴建議；經大幅增補、修改後，復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以及張玉法院士、連玲玲教授指正，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痕，卻更真實的呈現作者的書寫心情，也是許多記憶文本所沒有的特色。本文試圖從這本書觀察戰爭如何影響剛新婚的范小梵生活，身為知識女性，她是怎麼因應各種情境的改變？是否與男性不同？是否超越了性別藩籬？為了比較觀察，本文除與部分知識女性的戰時記憶略做比較外，也加入一些知識男性的記憶。

關鍵詞：第二次中日戰爭、家、知識女性、烽火歲月、范小梵

民國時期紛至沓來的各種事變、災難、戰爭，把近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帶入始料未及的境界。對這時期的知識分子來說，那不僅是國家浩劫，更是自己與家人生命相繫的事，以往被視爲女人的、瑣細的日常生活，一夕之間，成爲男性知識分子必須去承擔、去關切的大事，而女性更自不待言。

特別是第二次中日戰爭，造成中國人到處遷徙流離，也因此留下許多戰爭記憶，從回憶錄、自傳、傳記、口述紀錄、日記、小說到電影，不勝枚舉，引人發想。過去我曾運用口述歷史、傳記、回憶錄和小說等史料，討論第二次中日戰爭下中國與臺灣女性的婚姻與生活。[1] 但爲了對女性的戰爭經歷做較完整的探究，本文選擇名不見經傳的知識女性范小梵

---

1 游鑑明，〈受益者か、それとも被害者か——第二次世界大戦時期の台湾人女性(1937-1945)〉，收入早川紀代主編，《戦争・暴力と女性 3》，《植民地と戦争責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 78-100；游鑑明，〈改寫人生之外：從三位女性的口述戰爭經驗說起〉，《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27-154。

的回憶錄《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以下簡稱《風雨流亡路》）進行深度研究。[2]

無可否認的，關於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文獻檔案非常豐富，對於這時期政治、軍事、外交、財經的研究，也俯拾可得，但除了戰爭的大脈動之外，人民在戰爭中的感受或因應，同樣拉扯著戰爭的變化。本文試圖從這本兼有日記與回憶錄性質的個人戰爭經歷，觀察戰爭如何影響新婚的范小梵生活？在實際和心理上，她是怎麼因應各種情境的改變？與婆家的關係如何？身為知識女性，戰爭中所遇到的問題是否與男性不同？她是否超越性別藩籬？透過范小梵，我們如何在戰爭議題找到性別意涵？此外，由於這是經過整理的日記，難免會有時空交錯的著痕，卻更眞實地呈現作者的書寫心情，也是許多記憶文本所沒有的特色。

范小梵的戰爭記憶或記憶戰爭，是許許多多相同故事的寫照。以女性來說，清代女作家左錫嘉在太平天國戰亂時寫下的詩詞作品，便與范小梵有類似的經歷；[3] 而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不少女性的戰爭記憶，與范小梵更是相互呼應；

---

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3 太平天國戰亂時，左錫嘉的丈夫曾詠任江西吉安府知府，因蒙冤落職，後應曾國藩之邀，至安徽安慶佐軍，不幸積勞成疾，臥病太平營次；錫嘉得知丈夫病重，遂買舟前往，未抵達而曾詠已卒，忍痛扶柩返回吉安，籌辦喪事。其後攜稚齡子女運靈柩返鄉，孤帆數千里，既遭盜劫，又遇風暴，費時五月，歷盡艱辛，才將丈夫遺骨送歸故里成都。詳見林玫儀，〈卷葹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晚清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收入「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20 期 2（2010 年 6 月），頁 121-141。

但在女性知識分子中，能夠如此細膩而清楚地追溯戰時的經歷與心情起伏，范小梵是難能可貴的一位，我們可從中勾勒戰爭圖景的一角。爲了不讓范小梵的戰時記憶流於獨白，本文不只把部分知識女性的戰時記憶，與范小梵略做比較，也加入一些知識男性的記憶，特別是畫家豐子愷。[4] 他的流亡路線、經歷和對家庭的關懷，與范小梵有不少相似之處。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女性相較，多數知識男性的戰時記憶文本鮮少提到家庭。以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家老舍（本名爲「舒慶春」）爲例，1937 年 11 月中旬，他正在濟南齊魯大學任教，情況日趨緊急，到處都有敵機轟炸，老舍既不忍心帶著稚齡兒女冒險逃難，又不願意等著敵人入侵，最後是一個人走上流亡之路，因此他的自傳看不到戰時的家庭生活，著墨較多的是戰時的文藝活動或個人生活感想。[5] 而豐子愷卻不是一個人逃難，1937 年 11 月下旬，日軍砲轟浙江石門灣之後，他帶著「不堪爬跳、不能分班」的老弱婦孺，開始顛沛流離的生活，[6] 沿路上，他必須注意自己的安危，還得關心家中長輩、女眷、幼童的安全。因此，在以個人爲主體的男性戰時記憶文本中，豐子愷的日記與自傳，不時出現家中男女老幼的身影，以及他的細微觀察。[7] 這種把家庭

---

4 豐子愷(1898-1975)出生浙江崇德縣石門灣（今桐鄉縣石門鎮），幼年跟著他的父親就讀私塾，1906 年進西溪小學堂，1914 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1921 年赴日本，進川端洋畫學校學習西洋畫與音樂。曾在不少學校任教，並從事繪畫、寫作和翻譯等工作。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 1605。

5 雖然自傳提到四川時「家小在身邊」，但全無家人生活的記載。老舍，《老舍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頁 127-128、184。

6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頁 175。

7 詳見豐子愷，《教師日記》（重慶：萬光書局，1940）；豐子愷，《豐

融入自己記憶的書寫方式，相當難得，正可以和偏重家庭的女性戰時記憶，進行對話。

一、記憶戰爭：「風雨流亡路」為誰而寫？

回憶錄有來自回憶者自己的書寫，也有出自其他人編纂，無論記錄者是誰，背後都有撰寫動機。事實上，不是所有的回憶錄都會提供書寫目的，但這本兼具日記與回憶錄性質的《風雨流亡路》的序和後記，清楚地敘述范小梵寫這本書的動機，而范小梵爲何寫回憶錄？是爲誰而寫？

范小梵雖然名不見經傳，她的身世背景、身分地位究竟如何？根據范小梵在書中表示，她的本名是范坤元，戰爭期間，爲了能進浙江越光中學教書，她謊稱自己是北大畢業，不但把年齡多加 4 歲，虛報爲 24 歲，也從「安徽人」變成「北平人」，於是「范坤元」成爲「范小梵」；到 1953 年中共建國後，范小梵才恢復原籍，名字和年齡也回復原本。[8]

范小梵出生於 1918 年安徽桐城，初中畢業後，隨她的兄長范希衡到北京，並進入北京第一女子中學高中讀書。這期間，認識兄長的學生朱錫侯，但在自由戀愛無法被接受的時代，范小梵私自與中法大學哲學系窮學生的交往，遭到她的父母強烈反對，被迫返鄉，返鄉後遭到軟禁。當時，朱錫

子愷自傳》。

8 范小梵對自己做這麼大的改變，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婚姻之事離家出走後，家裡不願承認我這個『敗壞門風』的女兒，我就索性將自己的名字、籍貫全改了。」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8。

侯獲得赴法國留學的公費補助，急切希望能在出國前與范小梵結婚；范小梵得知消息，便向父親佯稱，願意到安慶考公費女師，於是趁機離開家鄉，再輾轉回到北京。1937 年 2 月 1 日，范小梵與朱錫侯結婚，但也與家人斷絕關係。[9] 婚後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范小梵與朱錫侯匆忙離開北京，一起回到朱錫侯的浙江老家；當年 8 月 24 日，朱錫侯離開杭州，從上海搭乘郵輪到法國留學，直到 1945 年 8 月底，夫妻再度重逢。[10]

對只讀過中學的范小梵來說，被定調爲「知識女性」是否恰當？不過，從她的敘述中，她確實稱得上是知識女性。除了七七事變之前，范小梵曾到北大歷史系聽課，又曾跟著丈夫參加北大《詩頁》的活動；[11] 丈夫去法國留學之前，還爲她訂閱一年的《東方雜誌》、《世界知識》，[12] 顯示她的學識超過中學畢業生。更何況，八年抗戰中，她先後在姚家埭小學、越光中學、承天中學、嵊縣中學、南平師專等五所學校當過老師，並當過麗水抗日歌詠團團員、地政處抄寫員、家庭教師、上饒廣播電臺播音員、《中央日報》記者等工作，這都需要有一定學識，才能勝任，而這也是她能在顛沛流離中自力更生的主要元素。

戰爭陰影籠罩下的民眾，他們的許多遭遇沒有年齡、性

---

9 實際上，戰爭時期，范小梵曾和妹妹有書信來往，也得知桐城淪陷後，父母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雖然「心碎如焚，也無法去管她們」。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3。

1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2、297-299。

11 《詩頁》是北大的小報式詩刊，在朱光潛指導下，由一群愛好詩歌寫作的青年學生創辦；除范小梵丈夫之外，還有林蒲、賈光濤、楊白萍、林南星、辛迪、賈漢川等人。

1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3。

別與階層的區隔，承載著相同的苦難。范小梵的命運也和所有人一樣，隨著戰局的變化，起伏顛簸，她在這本書中寫道：「1937 年對我來說，是苦難開始的一年，也是我不幸的巔簸一生的起點。」[13] 在顛沛流離中，就同很多難民一樣，范小梵經常得面對疾病、飢餓、貧困、空襲，尋找能填飽肚子的方法，以及暫時安身的住所；同時，還得建立新的社會網絡，學習異地文化與生活方式。但也不能否認，面對各種戰爭壓力和流亡生活時，范小梵的工作雖然經常短暫、不固定，然而知識女性的背景與原本的社會網絡，卻讓范小梵與沒有知識或出身貧困的女性有些差異，也比那些需要靠子女行乞或妻子做生意的知識分子，來得幸運。[14]

丈夫不在身邊的這段日子，范小梵如何表述內心的思念？抗戰時期，許多讀書人靠寫信，與親朋好友互通音訊或維繫情感，[15] 這也是范小梵唯一能向丈夫傾訴心事的方法，

---

1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9。

14 李丹柯在訪問抗戰時期的重慶女性時，發現抗戰加深底層女性的苦難，也讓她們更認清自己的社會性別身分；但出身世家的讀書人，也同樣面臨前所未有的貧窮，逃難途中，范小梵便親眼目睹一對來自北平的知識夫妻，帶著三個女兒蹲坐在公路旁擺地攤，賣的卻是他們自己的生活用品和衣物；而小說家王鼎鈞和瓊瑤的父親雖然都是讀書人，戰爭卻使年幼的王鼎鈞得行乞養家，瓊瑤的母親和父親則賣點心。以上請詳李丹柯，《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 48，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02，王鼎鈞，《昨天的雲——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一》（臺北：爾雅書房，2005），頁 127-134，瓊瑤，《我的故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9），頁 96-98。

15 王正華曾細膩梳理抗戰期間江蘇江陰縣祝塘鎮兩個家庭的書信往返，從中可以看出讀書人如何珍惜在戰時與親人通信。王正華，〈關山萬里情——家書中的戰時生活(1937-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17（2008 年 9 月），頁 87-128。

她把所有期待放在信裡：

> 我幾乎一個月總要寄去兩三封厚厚的信，當時的信是四角錢一封，無航空，是從海路運出去的。因而我每次寫信，總是把全部情感都放了進去，心裡總想著他一定會收到——至於他到底能否收到，只有天曉得了！常常是把一封厚厚的信往郵局的郵筒裡投進去時，彷彿自己的這顆心也一同放進去了，聽到信落在筒裡的聲音，就覺得自己這顆心也跟著一起沉落了進去……。[16]

即使戰爭結束前的後四年，她的丈夫杳無音訊，她依然不斷寫信、寄信，在她心裡：「一遍遍地固執地對自己說：他一定會收得到，一定會看見，會聽到我的傾訴」。[17]

然而，就算范小梵把相思塡滿信箋，她很清楚丈夫不一定能收到信，而且「寫信當然不足以表達出全部思想感情」，更何況有些事也不適合寫在信中，於是她把無法在信中陳述的事情，寫進日記裡，她樂觀地認爲「有一天我們相見互訴衷情時，我可以給他看我的日記」。[18] 也因此，當范小梵記日記時，即使在極度痛苦、困難、病危的情況下，她都沒有放棄過，一一記下這些血淚斑斑的足跡。[19]

很明顯的，這部日記的主要讀者是范小梵的丈夫，但當夫妻重逢時，她希望丈夫閱讀自己日記的期待，卻完全落空。范小梵痛苦地記著：

---

1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2。
1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1。
1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1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 但可悲的是，待他回來後我們重相見時，他不僅不看這些日記，而且連我訴說過去的經歷都不願聽。他總是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不要再提了。」因此，他對我八年的流亡生活根本不了解。[20]

丈夫不看也不想聽的冷漠態度，讓她相當受傷，甚至懷疑當年愛戀的選擇，她直率地表示：「漸漸地我發現，他也不是我當初理想中完美無缺的偶像了。」[21]

所幸，范小梵並沒有因此而撕毀或丟棄日記；然而到了文革期間，這部日記卻遭到損壞。據范小梵的女兒朱新地指出，當時日記被抄走，經過她父親朋友的奔走，日記終於失而復得，卻已經殘破不全。在目睹大木箱中的母親日記時，朱新地感慨地說：

> 實際上也只看到外觀：毛邊紙，豎排行，有些甚至是毛筆寫的，難怪有那麼一大箱。也真難為母親，抗戰時期四處奔波，東躲西藏，從浙江一直流亡到昆明，竟然還沒有把這些東西丟掉。[22]

面對面目全非、甚至被水浸泡而無法辨識字跡的日記，范小梵原本不想去翻動，也不願意讓剛癒合的傷口再度流血，但在一股力量支持下，她決定寫下去。范小梵告訴自己：

> 這些是我個人生活實錄的東西，對於我來說，可以從中檢查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年輕時）的思想、言行、奮鬥、幻滅，以及整個生活。[23]

---

2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2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22 朱新地，〈整理後記〉，收入《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00。

23 范小梵，〈回望當年——翻閱舊日記所感〉，收入《風雨流亡路：一

於是范小梵利用閒暇整理日記。後來，在朱新地要求下，范小梵交給女兒四大本整理過的日記，朱新地再以回憶錄方式出版這本書。[24]

因此，儘管范小梵原先預設的主要讀者，讓她吃了閉門羹，但經由她的修飾、整理，以及女兒的包裝，這本兼有日記與回憶錄的文本，擁有的讀者不是單一，而是群體。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范小梵「個人生活史料的庫存『檔案』」，[25] 也爲戰爭史留下見證。

必須一提的是，由於《風雨流亡路》的日記原稿有部分已經破損不全，許多內容是透過作者的追憶而還原，因此，作者在撰寫時加入一些事後的感想。這樣的寫作方式，固然與原本日記有落差，但仍不乏眞實，而且透過作者過去與現在的自我對話，更呈現這本戰時回憶錄的價值與特殊性。

二、寄人籬下的生活

中日戰爭時期，到處都是流離失所的人，范小梵也同樣過著四處爲家的漂泊日子，不過，令人好奇的是，這位與婆家共居的新媳婦爲何需要寄人籬下？她與婆家之間是否發生甚麼問題？

傳統中國人過著大家庭的生活，民國之後，受新式教育

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

24 朱新地，〈整理後記〉，收入《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97-308。

25 范小梵，〈回望當年——翻閱舊日記所感〉，收入《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

的年輕人開始組織小家庭；[26] 但戰爭讓家庭結構又有新的變化，有人被迫離開大家庭，過著形單影隻的流亡生活，寄人籬下或無家可歸，普遍可見；有人則從小家庭走回大家庭，與大群親友共度戰爭歲月。這兩種型態都曾出現在范小梵的流亡歲月裡，與許多女性比較起來，從與丈夫朱錫侯私奔，到兩人共組小家庭，范小梵是一位不斷挑戰傳統的新女性，而戰爭卻迫使她必須脫離小家庭。

1937 年 7 月 13 日，范小梵隨著丈夫朱錫侯回到杭州老家；[27] 朱錫侯在杭州短暫逗留，便從上海負笈留學。走回大家庭，又得和從未謀面的婆婆、小叔同住，這對范小梵這位新女性來說，確實是不小的考驗；她當時抱著「崇高的、義不容辭的責任」，到丈夫家裡：「照顧他的『老母弱弟』，好讓他安心在國外讀書」，[28] 但與丈夫家人同住後，她才發現這個決定是「多麼幼稚可笑」。日記中，不斷記載著婆媳相處的無奈與痛苦，晚年回顧這段往事，她還是耿耿於懷：

> 這一決定，在以後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的生活中，仔細回味檢討起來，究竟有多少是對，多少是錯呢？人的一生就這麼過去了，雖然說是無愧於人生，但究竟做了點甚麼有價值的事呢？只能總結這麼一條，靠著我這根不屈的脊梁骨和開朗的性格，頂住了多少人生的

---

26 五四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提出建立小家庭、改革家庭、廢除家庭制度的論點。詳見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對中國家庭問題的討論，1915-1923〉，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下冊，頁 901-919。

2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9-22。

2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

> 不幸和逆流橫禍，至今得以以不死之軀，活著來回味這無端苦澀的人生滋味吧！[29]

范小梵爲何如此矛盾？其實她和婆婆、小叔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她丈夫出國後就出現：「自從他走之後，仿佛我和這個家庭就沒有紐帶，生活沒有了酵素似的，空氣變得沉悶」。[30] 回想和婆家的相處，她坦白地說：

> 現在回想，按今天的科學術語來說，我對他們母子是個外來的人，他們有他們的環境，有他們的「場」，我進不去，雖然我原先設想的和錫侯所預料的全以為我是他們家的人，其實，我錯了，他也估計得過於天真了。[31]

嚴格來說，這是許多傳統家庭中常見的情形，並不完全因戰爭而引發；但當杭州的戰局變得詭異，糾結在婆媳之間的問題，就比平日複雜得多。

1937 年 10 月初，范小梵的婆婆獲得小道消息，以爲國慶日將會停戰，又恐停戰前會遭到洗劫，決定到女兒的李姓夫家紹興避難，於是范小梵跟著婆婆、小叔，開始寄人籬下的生活。[32] 從范小梵的回憶可以看出，與婆婆、小叔的相處雖然不自在，寄居親戚家的日子卻更加痛苦，特別是婆婆的娘家人——舅舅、舅母一家人也逃至李家之後，范小梵嘗到大家庭複雜的人際關係。

一個丈夫不在身邊的新媳婦，范小梵唯一能討好大家的

---

2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

3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3。

3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

3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2-26。

是謹言愼行、勤懇做家事。不過，范小梵覺得，自己在婆婆和婆婆的親人眼中，只是個外人，加上她來自北方，滿口北京話，在南、北百姓相互看不順眼的情形下，范小梵認爲「江南人一般自以爲聰明伶俐，高人一等，常常奚落北方人，稱他們是『北佬兒』」，而這個帶輕蔑的稱呼，也落在她身上，讓她成爲被取笑的對象。[33]

最讓范小梵無法忍受的是，舅母原本希望把女兒嫁給朱錫侯，卻不料朱錫侯選擇了她，於是經常在范小梵和她婆婆之間搬弄是非，婆婆本來就嫌她是「白嚼食」的人，[34] 這一來，對她更加冷淡，有時還冷言相譏或是露骨謾罵。在這樣的環境下，范小梵覺得自己遲早要被「折磨得發瘋，甚至磨死」。[35] 而這種「折磨」，直到紹興的形勢也不穩，她們和舅母一家人各自分頭逃亡之後，才稍微停止。[36]

從范小梵關於語言的敘述，提醒我們注意，戰爭時期天南地北的民眾，紛紛逃入異鄉，如何克服語言問題，變得很重要。不過，范小梵顯然沒有在語言上，拉近與周邊親友或鄰居的關係。當范小梵全家與紹興李家人一起逃離到坡塘附近的應家潭時，語言再度成爲她與人們相處的障礙，由於無法與鄰居溝通，她被當成是「異國人」，而范小梵也因爲沒有打交道的機會，碰到任何鄰居或城裡逃來的「難友」們，她乾脆笑笑，或搖頭、點頭，不說一句話，因此，范小梵自嘲一向說話、演講口若懸河的她，變成村裡人口中的「啞

3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4。

34 指多餘的人。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4。

3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4。

3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42。

吧」。[37]

然而，離開坡塘，過著自立更生的日子時，范小梵在語言上的「自閉」不再出現。例如，爲越光中學學生講課，她擔心學生聽不懂北京話，講話時特別放慢速度。[38] 此外，從紹興開始流亡後，她與各地方人們往來，雖然經常遇到語言溝通問題，卻都能圓滿解決。[39] 范小梵不願與親友、鄰居多做溝通，或許是因爲她不想招惹是非；而走出婆家，必須單打獨鬥時，她卻沒有這方面顧忌。撇開范小梵的個人心結不論，語言障礙在戰爭時期是否普遍？男女兩性是否有差別？是可以進一步探究。

此外，開門七件事向來由女人負責，而女人並沒有因爲流亡異地而免除，反而更加辛苦，即使是知識女性也一樣。范小梵與婆婆、小叔逃難的那段日子，因爲進入民俗文化不同的地方，必須面對新的考驗，她是否入境隨俗？或我行我素？

以居住紹興爲例，這個水鄉城市的美麗風光，讓范小梵在鬱悶的生活中找到了心靈寄託；但每天機械地做著家務事，卻是她的噩夢。就拿燒火這件事來說，因爲燒火的方式不同，范小梵曾苦惱不堪，回憶寄居李家時，她和婆婆因爲不習慣燒火灶，便改燒柴火的風爐。這種爐子是黃泥燒製的，像一只小缸，缸前開個大方口，必須把柴送進去燒，燒

---

3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41-42。

3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62。

39 麗水歌詠團巡迴演出時，並不受到歡迎，她揣測是因為地方百姓聽不懂他們的語言，而啞劇的演出，則激起大眾共鳴；另外，到廣東曲江時，語言不通，也不懂飲食與風俗民情，住宿、吃飯、點菜必須請通廣東話的同伴處理，她和友人胡剪虹儼然像兩個啞吧。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8、227。

不著時，滿屋子都是煙，嗆得鼻涕眼淚直流。[40]

而范小梵最受不了的是倒馬桶，初到紹興時，她發現當地有個很特別的現象，幾乎每家有茅坑：

> 除了最大的一條街上外，其餘的大街小巷幾乎幾十步就有一個茅坑，那茅坑並不是房子式的，而是用稻草搭成的三角篷子，下面放一只大缸，缸口上放兩塊木板。[41]

後來才明白，因爲當地地少人多，種田主要靠糞肥，因此，每戶人家都用大糞來賣錢；李家後門口就有一個茅坑，糞便除了自己澆菜之外，還賣給農民，一個月可以賣一、兩塊大洋。[42] 而李家老太太每到農民來打糞前，總要摻些河水，這樣可以多裝幾桶，多賣些錢。[43] 也因此，范小梵必須入境隨俗，小心處理這「貴重」的東西。

當時，李老太太給他們一家三口一個十多斤重的大馬桶，馬桶沒有可提的環，如果隔天倒一次，范小梵可以承受，偏偏老太太有禁忌，只要是菩薩生日，就不能倒馬桶。由於常常一連好幾天是菩薩生日，馬桶的穢物就越積越多，到可以倒馬桶時，范小梵只得咬緊牙關捧起馬桶，小心翼翼地穿越廳堂、跨過門檻，既不能讓自己跌倒，更不能把馬桶的穢物潑出。[44] 事實上，馬桶文化在中國社會司空見慣，知識女性處理馬桶穢物也不罕見，不過，紹興的風俗和李家的規矩，讓寄人籬下的范小梵哭笑不得。

---

[4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1-32。
[4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4-35。
[4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5。
[4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5。
[4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5。

范小梵的境遇明顯地告訴我們，雖然她是受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但身爲女性，她同樣不能跳脫中國傳統社會加諸媳婦的各種壓力，特別是在生活困頓的戰爭時期。這卻也是女性知識分子與男性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因爲在男性的戰爭經歷中，我們看不到這種種。

三、自力更生

戰爭讓許多人失去工作機會，而爲了生存，也有許多人積極尋找工作。范小梵原本依賴丈夫生活，到了婆家則靠婆婆和自己微薄的積蓄過活，也因此很在乎「白嚼食」這個說法。爲了不讓自己繼續成爲婆婆口中的「白嚼食」，離開夫家的想法經常縈繞在范小梵腦中，她不時呈現焦慮與不安，也看到她透過書信和日記，向丈夫表達自己的無奈，希望獲得丈夫體諒：

> 我不能再在這裡待下去，我必須離開這裡，另一方面，我又怕辜負了錫侯的托付，我應該擔起照顧他「老母弱弟」的擔子。怕對不起他，可人家又不需要我，我又何苦呢？我又想，如果我就此死掉了，不是更對不起他對我的愛麼？就這麼在被人折磨又被自己折磨之下，每天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像一只將死的老馬那樣拉著生活的磨盤。……我覺得我只得寫信給在海外的錫侯，告訴他我在這裡的生活，告訴他我有負他的所托，我將離開這裡的打算。[45]

---

[4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36。

范小梵甚至寫信求助朋友，直到在應家潭遇到同是「難友」的鄰居胡剪虹，她才擺脫與婆家相處的日子。

和稱她是「啞吧」的鄰居不同，胡剪虹全家在知道范小梵的身世後，經常與她聊天，慢慢開啓范小梵不同以往的戰時生活世界，胡剪虹更推薦范小梵到她任教的姚家埭小學兼課。[46] 然而，如何讓范小梵離開婆家？據范小梵敘述，胡剪虹告訴她婆婆，如果范小梵在學校教書，就可以不用家裡生活費，於是她的婆婆欣然同意她到外地教書。[47]

1938 年年初，范小梵展開另一段戰時生活，並且在貧窮、飢餓、賒債、疾病、空襲、逃亡交錯中自力更生，儘管仍擺脫不了寄人籬下的命運，所幸這一路得到親戚、朋友、學生或陌生人的幫忙，每次遇難或受苦，都得以重生。

（一）驚心動魄的居住環境

有關中日戰爭的各種文類中，讀者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日軍的暴行，但趁火打劫的偷竊、搶劫等行徑，也在這時普遍可見。雖然行竊等現象不是戰爭時獨有，但不可否認，戰爭帶來的貧窮，讓不少人鋌而走險，因此，遭受盜難或被竊的經歷，深植於許多人的記憶裡。

在豐子愷的逃難過程中，便不時出現遭竊、行搶的驚恐，據他回憶，剛開始逃難時，他曾把行李寄放朋友家，但當這地方淪陷後，就發生盜劫，他所存寄的東西全數被搶。[48] 曾在國語日報工作的張王銘心也指出，戰爭時，讓她一家人擔

[4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48-53。
[4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3。
[48]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06。

心害怕的，不是日本兵、而是盜匪。據她描述，在一個臘月 27 日的晚上，4 個軍人打扮的搶匪闖入他們在衡陽的家，幸而她父親機智地應對，才讓全家逃過一劫。[49] 這雖然是豐子愷、張王銘心的個人經驗，卻也說明民眾在這場戰爭遭逢的傷害，不只是日軍，還包括中國的小偷、土匪。

對單獨逃亡的女性而言，劫難更是無所不在，范小梵就曾有許多驚心動魄的經驗。剛到姚家埭小學教書，范小梵雖然有了棲身之地，住處卻充滿危機。當時她和胡剪虹住的屋子靠近操場，由於操場外的圍牆很矮，老工友又住在操場的另一角；而通往男老師住處的門，經常被反鎖。[50] 因此，她們的住處成為宵小之徒覬覦的目標，這兩位手無寸鐵的女性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盜難？

范小梵的日記寫著，在一個風雨大作的夜晚，她憑著過去的經驗，認為晚上會鬧賊，就和胡剪虹預做準備，她們用椅子頂著無法上鎖的門，並在門上掛著上課用的搖鈴，以防竊賊潛入。果然在她們朦朧入睡時，聽到石頭落地的聲音，兩人立刻起身查看，為引起正在打麻將的男老師們注意，她們拚命敲著通往男老師們住處的門，好不容易驚動他們，但男老師們查看後，並沒有找到任何問題，范小梵和胡剪虹卻因此一夜難眠。直到第二天，工友的女兒發現，她們窗外的磚牆被挖了一個足以容納單人進出的大洞，因為是雙層牆，小偷挖到底層時，掉下一塊磚塊，范小梵和胡剪虹聽到的，

49 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紀錄，〈張王銘心女士訪問紀錄〉，收入游鑑明、羅久蓉、瞿海源訪問，《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77-78。

5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5。

就是這片磚塊掉落的聲音；幸而她們大聲喊叫，嚇走了小偷，不過，小偷臨走前，還是順手偷走工友煮飯的用具。[51]

1940 年年初，局勢變得更緊張，范小梵和胡剪虹兩家人回到坡塘鄉下，在人心惶惶下，老人家都很擔心一旦日軍入侵，年輕女性會遭蹂躪。[52] 而范小梵自從工作後，因爲有能力補貼家用，和婆婆關係改善不少，因此掙扎在走或不走中，她寫出這時複雜的心情：

> 離開老人和良弟，我有些於心不安，覺得對不起錫侯的托付，而帶他們一起走，又到哪裡去？……捨不下老人和良弟，一則是我答應了顏，[53] 我應該信守承諾，另一方面自從我工作以後，彼此的緊張關係改善了不少，覺得自己越來越長大，挑起重擔的責任心更強了，而對他所托付的老母弱弟也確感到不忍心。[54]

但如果日軍入城，不僅走不成，又會再度成爲白吃閒飯的人，最後她勉強決定：走；帶著一只小皮箱，一床薄被，范小梵眞正踏上流亡之路。[55] 這之後，她仍心繫婆家，當她得知婆婆罹患瘧疾時，曾經想回去照顧，但沒有返家的盤纏，交通又已阻斷，只好託付胡剪虹的母親代爲照顧，卻因此招來小叔的埋怨。回顧過往，晚年的范小梵感嘆道：「看來人是應該學得自私些才對」，而當時的范小梵卻默默承受指責。[56]

---

5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5-56。
5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0。
53 指范小梵丈夫，書中又稱「顏顏」或「朱顏」。
5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0。
5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0。
5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3-154。

其實戰爭期間，女性放棄照顧長輩，不只出現在范小梵或其他中國女性身上，這似乎成爲一種普世現象。宋漢理(Harriet T. Zurndorfer)發現德國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時，有不少猶太女性爲了生存和逃命，背棄了年邁雙親和幼兒。[57] 但這種割捨親人的掙扎、矛盾，在《風雨流亡路》中反反覆覆地出現，也說明中國女性在面臨敵軍轟炸、性侵的壓力時，家庭責任仍揮之不去。

離開婆家後，范小梵的居住環境無不充滿驚恐。儘管范小梵的遭遇也發生在當時許許多多人身上，然而，與其他逃難的人相較，她經常只是個人行或雙人行，同行的又都是女性；不像採集體或有組織逃難的人，與家人同行或跟隨學校、機構撤退，比較容易受到公私救濟單位的照顧。[58] 因此，范小梵的問題是接二連三，這些刻骨銘心的經驗深烙在范小梵的的記憶裡，無論是原本日記或後來的回憶錄，絲絲入扣地呈現每一個過程，充分反映戰時知識女性的居處面臨何種困境，以及她與同行女伴又如何機智因應。

例如，離開坡塘後，范小梵和胡剪虹結伴同行，最驚險

---

57 Harriet T. Zurndorfer, “War and the Silent Women: The Retrieval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Jewish Women’s Narratives of World War II,”《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7（2009 年 12 月），頁 124。

58 張玉法指出，戰時逃難有兩種：一種是集體、有組織的，一種是個人的，或以家庭為單位的。他還以戰後集體逃亡為例，當時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讀書，常有歹徒夜半入侵女生宿舍，學校會安排訓導處人員值夜持槍巡查。在齊邦媛的回憶中，也看到當時她父親負責把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撤退到大後方時，沿路都做了規畫與安排，例如抵達桂林時，男生住在七星岩岩洞，女生則住在臨時搭建的草棚。張玉法，〈戰爭對中國婦女的影響(1937-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7（2009 年 12 月），頁 163-167；齊邦媛，《巨流河》（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66-105。

的莫過在嵊縣旅館住宿的那一夜。范小梵描述，當她們走入旅館時已經是黃昏，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兩人爬上窄而陡的樓梯，上了樓，才發現地上睡滿了人，而且全是男人。在不知將被安置在何處的慌亂中，小伙計打開一個竹片編的門，裡面擺了一張也是竹片架的床，四面牆則是糊了泥巴的竹片；因爲年久失修，滿是窟窿，因此外面人睡的聲音，不但聽得清清楚楚，連地上躺的人也差不多看得見。[59]

睡在這樣一間「路路通」、一掌就能打破門和牆的房間裡，范小梵她們怎麼防範壞人的趁虛而入？范小梵記道，摸黑中，她們把小包放在頭頸下，一邊當枕頭，一邊設法將門關緊，偏偏那個門怎麼也關不緊，也不能上鎖，她們只好用三條腿的小桌子頂門。但好不容易躺下，只聽見睡在門外地舖上的男人發出各種聲音和異味：

> 有的打著可怕的鼾，還有磨牙聲、夢囈聲，有的噴出濃烈的燒酒味，有的在相互用粗話罵人，有的起來在糞桶裡小便，聲音此起彼落，從未停息過。[60]

回憶這一夜，范小梵很慶幸她們沒有碰到壞人，倒是聽到的聲音令她們「肅然懍然」。[61]

1941 年春天後，日軍開始往內陸侵犯，形成大量的逃亡潮，范小梵的處境比過去還要艱困。那段日子，日軍經常在范小梵落腳的溫州投擲炸彈，她記得，4 月 19 日天不亮，就有敵機飛來，一直盤旋不走。[62] 溫州百姓得知日軍可能入城

---

[5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5。
[6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6。
[6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6。
[6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37。

的消息後，許多人往鄉下逃難。對范小梵來說，她根本沒料到這次的逃難，所面對的不僅是陌生的男人，還有可怕的日軍，而且得處處爲家，屋樑、戲臺都成爲她暫時棲身之地。

當時，范小梵寄宿在張家，由於張家在各地都有關係，范小梵決定隨著張家人逃難；但爲了替胡剪虹買東西，她沒有搭上張家人乘坐的船，而是搭了地政處職員的渡船，離開溫州。沿途不斷有機關槍掃射，又因船隻超載，行走緩慢，全船的人驚恐不已，等渡船靠岸後，大家急忙奔往鄉村。[63] 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范小梵只好跟著地政處同事和他的女友顧女士，住進他們的朋友家；原以爲可以暫且安心，不料，第二天黃昏，日軍就進村了。慌亂中，范小梵和顧女士三人藏身稻草堆潛逃，幸而有一戶人家收留他們，把他們安置在一個閣樓上。這個「閣」樓，其實只是在穿堂橫樑上擱置幾塊木板，再用一根草繩束著幾把稻草，像個遮風雨的草簾子，因此，他們必須縮著身體緊緊相挨，才不會使頭腳外露。最驚險的是，當天黃昏的一場驟雨，把路過的日軍引進穿堂躲雨，躲在穿堂橫樑上的他們，根本不敢動彈；次日上午，那家主人以爲日軍已經走了，搭梯子讓他們下來，但當范小梵第一個下來時，被眼尖的顧女士發現，還有一個日軍在窗外，范小梵迅速爬上梯子，直到下午才敢下來。[64] 這一天半的折騰，對范小梵來說是十分難忘的記憶。

離開民宅後，范小梵繼續逃亡。溫州北邊是多山地帶，范小梵就在這崇山峻嶺中奔逃，在往碧蓮行進時，同行的人都打算投靠親友，惟有范小梵舉目無親，只好四處借宿。有

6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37-139。
6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40-143。

一晚，來到一個村子，因爲范小梵的衣箱早隨著張家的船被載走了，衣服單薄的她，央求農家讓她過夜，但即使是在門前放一把稻草，也沒有人家願意；幸而，一位也是操北方口音的中年婦女，給了她一床沒有被子、裡子的新棉胎，又用兩條長凳架起一塊門板，她才能在大廟裡的戲臺上安穩地睡了一覺。[65]

十多天後，日軍離開溫州，流亡的百姓終於可以回家，每個人臉上洋溢著歡愉，但對長期漂泊的范小梵來說，她是「處處無家處處家」，至於「今晚寄宿何處，明天又將流落到何方」，對她似也無關緊要。[66] 范小梵離開婆家後，她的「家」包括宿舍、朋友家，甚至路邊空地、屋樑、戲臺，都是她臨時住宿的「家」。就如研究抗日戰爭史的學者孫豔魁指出，對大多數難民來說，所謂「處處無家處處家」是：「他們每到一地只要能活下去，稍稍可以喘口氣，就暫時在那裡停頓下來。」而且「一旦戰事臨近，他們往往毫不猶豫地拋棄這個『家』，又往前走，不知在哪裡又建立起另外一個『家』。」[67]

在溫州短暫逗留後，她決定西行，走往浙江邊界，接著是江西、廣東、福建、貴州、雲南等地，然而，這時大批的民眾也都往這些地區移動，住宿、物資和交通工具比先前更加窘困。面對愈發不方便的居處環境，范小梵和她的女伴危機四伏，她們怎麼應變？男性友人是否給予援助？或冷眼旁觀？

---

6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45。

6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49。

67 孫豔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 49-50。

1941 年 12 月，因爲工作無著，范小梵到處借貸，幸而在朋友介紹下，她到了設在江西上饒古岩寺的廣播電臺上班。雖然她和一位女同事黃援華同住一間小屋，卻因爲屋子的牆壁和門是用江西生產的竹子編成，門根本不能上栓。[68] 又是一個風雨之夜，范小梵再度遇到驚險，當晚，她和黃援華剛入睡，就感覺有東西碰觸她們，原本以爲是老鼠，范小梵擦亮火柴，才知道是在屋外站崗的衛兵，當時黃援華大哭大叫，范小梵則大聲喊叫，終於喊醒其他同事，也爲她們解除危難。[69]

而這事件的背後充滿性別危機，因爲衛兵原本要非禮黃援華，幸虧范小梵大喊，才讓他無法得逞，於是引起女同事們的憤慨，要求電臺慎重處理。詎料，處理事件的行政長官認爲反正沒有造成事實，不需要盤問這件事，也因爲臺長不在，他們不願意負責。這種試圖模糊眞相又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心態，惹惱范小梵等人。除了群情激憤外，黃援華也請在憲兵團工作的表哥出面關切，而管衛兵的營長竟然僞稱衛兵有精神病，試圖爲他脫罪；爲此，范小梵以證人身分否決這個荒唐的理由，衛兵終於迫不得已認罪。[70] 范小梵指出，雖然後來她們搬遷到裡面的屋子，不再有安全的疑慮，她卻有很長時間無法安然入眠。[71]

事實上，讓范小梵和她的女性朋友或同事驚恐的，不光是活人，她們還得與臭蟲奮戰，甚至和死人打交道。1943

---

[6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83。

[6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84-186。

[7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86-188。

[7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88。

年 9 月 18 日，范小梵又與好友胡剪虹一起逃難，搭大卡車奔波了兩個多月，她們在 11 月 19 日抵達昆明吳井橋，暫時找了一家旅館住宿。這一夜，她們再度失眠，不過，這一次讓她們失眠的不是男人，而是無以數計的臭蟲。據范小梵形容，當她們躺下不久，開始全身發癢，而且那小東西越來越多，她們完全無法安睡，乾脆起身與臭蟲作戰，她們點了蠟燭燒床上臭蟲，本以爲燒完就可高枕無憂，但才朦朧入睡，臭蟲又來侵襲；於是她們決定和臭蟲奮戰到底，把整個床板都抬起來，沿著板縫一條條的燒，等臭蟲死的差不多，蠟燭也燒光，天也亮了。[72]

與臭蟲奮戰的經驗，是抗戰時期許多人的噩夢。曾任教臺大外文系的齊邦媛，在南開中學的四川分校就讀時，爲了對付宿舍的臭蟲，雖然每隔幾個禮拜，她和同學抬著自己的木床去蒸汽室燻臭蟲，但完全沒有辦法控制不斷增多的臭蟲。她回憶：

> 晚上，宿舍在考試前會晚一兩個鐘頭熄燈，我們挑燈夜戰，就會看到那盞沒燈罩、直接由電線接上的燈泡上，一串一串臭蟲沿著電線爬下來的恐怖情景，就連地板上也有數不清的臭蟲從腳旁爬過來。[73]

齊邦媛表示，那和日本飛機一樣可惡的臭蟲，也幾乎是鋪天蓋地似的纏住了她們。[74]

對走過抗戰流亡生活的人們來說，遇見死人幾乎司空見慣。當時許多人不是死於日機轟炸便是疾病，抗戰時期擔任

---

7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24-226。
73 齊邦媛，《巨流河》，頁 119-120。
74 齊邦媛，《巨流河》，頁 120。

軍醫的楊文達便提到：

> 戰時一切簡陋，流行霍亂、痢疾、瘧疾、鼠疫等疾病，死亡的人很多，街上死屍無人管理。[75]

1942 年，范小梵工作的電臺遷徙到閩北，這是個多山的地區，山上又多杉木，很容易生長繁殖惡蚊、毒蠅。許多逃難來的外地人，因爲水土不服、過度疲勞，加之惡毒昆蟲侵襲，又缺少醫藥和金錢治療，死於疫病的人非常多，路旁邊、山丘旁，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個新土堆，埋著死難者的屍體。[76]

日機轟炸後的地區更是屍體橫陳，1940 年 10 月 13 日，日軍轟炸位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校區時，在該校任教的費孝通一走出門，看到讓他毛骨悚然的景象，就是「血跡滿地、屍橫街巷」。[77] 當時僅是少女的齊邦媛也有同樣的經驗，重慶被炸得最兇的一次大火後，他們一群初三的童子軍在老師帶隊下，準備進城去共赴國難，走了大半路程，只見「士兵從未熄的火中抬出無數焦黑屍體由軍隊運出城」，那一具具焦黑的屍體，綿延十里，這段經歷成爲齊邦媛「半生的噩夢」。[78]

無可否認的，隨時隨地可以看到死人，成爲戰爭時期許多男女老幼的集體記憶，也改變許多人對生命或身外之物的看法，變得淡定、冷漠。例如，豐子愷發現，有一次，女兒豐陳寶隨著護士去看一隻因瘋狗咬傷而割下的腿，對這宛如

---

75 熊秉真訪問，鄭麗榕紀錄，《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 38。

7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05。

77 易社強著，饒佳容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新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311。

78 齊邦媛，《巨流河》，頁 126-127。

轟炸後的情景，這個小女孩竟然不覺得可怕。[79] 而嘗盡各種經歷的范小梵，更是如此，她和胡剪虹離開昆明後，往曲江、桂林、柳州、金城江、南丹、獨山、都勻等地前行，再從貴陽西行，沿路在一家旅館暫住，這家旅館是土基砌的土床，上面鋪玉米桿、還有稻草編的墊子，與過去的旅館相較，算是不錯的住處。[80] 只不過，這家有人過世，外面排放著兩口棺材，她們住在裡面一間，每天進出，都得從棺材旁邊走過；但范小梵卻輕鬆地說：「夜晚點支蠟燭，與死人做了近鄰，倒也互不相擾，平安無事。」[81]

從前面范小梵的一連串故事可以看到，在流亡路途中，范小梵經歷無數驚濤駭浪的居住環境，除了飽受臭蟲侵襲、與死人為鄰之外，身為女性的范小梵和她同住的女伴，為了在戰爭浩劫中存活，她們要比男性更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甚至要在沙文男性中，為女性爭取公道，而這都是男性知識分子不會有或少有的經驗。

（二）貧病交迫的日子

1.疾病纏身

前面提到，戰爭時期因為一切簡陋，各種疾病四處流竄，范小梵便經常病痛纏身，在不停遷徙流離中，她如何克服疾病？經常三餐不繼的她，又怎麼有能力就醫？

與婆婆共處的日子，范小梵不僅情緒緊繃，也因為操心勞

---

79 豐子愷，《教師日記》，27 年 10 月 30 日，頁 10。

8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0。

8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1。

累，身體狀況始終不佳。1938 年的春天，她的病更加沉重，卻又不敢告訴婆婆，天天硬撐著，總期待能離開那個環境。[82] 到姚家埭小學代課時，范小梵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經常出虛汗，雙腳腫脹痲木，她知道自己需要休息，還需要營養和治療。[83] 住在坡塘時，胡剪虹曾帶她去看中醫，她的症狀多得嚇人，連精神都有些失常，有兩位中醫甚至認定她已經病入膏肓，幸虧有胡剪虹幫忙，以及胡剪虹母親爲她煎藥，多少減輕病情。[84]

事實上，范小梵根本沒有餘裕治療疾病，手中的 70 元用罄後，靠乾媽寄來的十元八元，也只能治治停停。范小梵寫著，每次，她走過西醫院，很想進去躺躺，但她根本不敢進去，一直到位在紹興的教會學校越光中學教書，她的健康才獲得改善。[85] 在越光中學，范小梵有了固定月薪，住處也比過去舒適，而飲食方面，是四菜一湯，每天都有葷食，不缺營養，不像婆家只吃白菜、蘿蔔或一點鹹魚乾。她甚至能到學校的教會醫院看病，經過 X 光檢查，證實自己的身體器官沒有問題，只是過度疲勞、環境惡劣和精神壓抑，造成了所謂「虛損」。[86]

從范小梵的說明顯示，居處環境與飲食的改進，以及西醫的治療，讓「病入膏肓」的說法不攻而破。然而，范小梵的敘述也提醒我們注意，她的疾病不只是來自婆家的壓力，

---

[8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2。

[8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5。

[8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7。

[8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7-58。

[86] 范小梵的月薪是 16 元。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61。

包括婆家飲食的缺乏營養、醫療技術的不科學，都讓她的身體亮紅燈，而這顯然與范小梵所受的新式教育有很大關係。例如，她講究均衡的飲食，也信任西醫的科學治療，即使在戰爭時期，她仍堅信不疑。

但好景不常，1939 年開學不久，敵機經常來轟炸，最後，范小梵被迫離開紹興、坡塘這些地方，往後的流亡生活經常三餐不繼，健康再度亮起紅燈。特別是在古岩寺的電臺工作時，天天吃糙米飯和沒有油水的青菜、蘿蔔；范小梵又常常整天只吃一碗飯，逐漸營養不良，加上長期勞累，病痛又更嚴重，比如胃痛、脫髮、皮膚乾燥脫屑、月經不正常等。最糟糕的是，廣播工作讓她得了喉嚨痛的職業病，一天喊幾個小時，即使喉嚨痛，還得喊下去，越喊越痛；而且經常渾身發冷、頭昏頭疼，搬到裡間的屋子後，因爲濕氣重，她的小腿還不時抽筋。[87] 儘管范小梵知道這都是營養不良、疲勞過度引起的疾病，但在當時的條件下，營養和休息根本是緣木求魚，她只能苦熬硬撐著。[88]

當范小梵隨著電臺到閩北後，如同前述，因爲環境惡劣，許多人罹患疫病，甚至死亡。范小梵也因此罹患瘧疾，三天兩頭發一次，一陣熱一陣冷的，冷起來蓋了幾床棉被還直抖。[89] 但范小梵仍然硬撐，發作過後，她就工作、走動；結果可能熱度太高，她曾昏迷了好多天，這期間，同事和朋友輪流餵食她鍋巴水。清醒後，范小梵決定到城裡找醫生吃藥；爲了方便就醫，她隻身住在城裡的辦事處，並找了一位

---

8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82。
8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82。
8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04。

中醫師看診，醫師竟判定她得了傷寒，服藥後的第三天，她就動彈不得，陷入昏睡。幸好被范小梵表哥的朋友發現，帶她到西醫院治療，打了一針專治瘧疾的藥，她才死裡逃生。[90]

從范小梵的疾病纏身，顯示戰爭時期人們沒有生病的權利，特別是流亡在外的貧困百姓。而貧窮是當時許多在大江南北顛簸流離的百姓共相，即使是來自中等家庭又是知識女性的范小梵，也無法預料在自力更生的流亡期間，得經常靠借貸或受親友接濟，才能度過重重難關。一旦生病，不僅需要仰賴朋友，還得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看病。

2.失業與飢餓交迫

生病需要有良醫治療，更得要有金錢奧援，而金錢還可以讓烽火歲月下的民眾免於飢餓，但在流離失所的生活中，許多人被迫拋棄家產、身無分文，根本無法餬口。這種情況下，有的人只好鋌而走險，作奸犯科，有的人則設法尋找謀生的機會。然而，對不斷遷徙的民眾來說，他們不僅居無定所，工作也時有時無，經常處在失業與飢餓中，范小梵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於沒有長期抗戰的準備，范小梵從北京到婆家所帶的積蓄非常有限，前文提到，她的婆婆認爲她是「白嚼食」的人，必須靠婆家過活，而且她連看病的錢都籌不出來。直到在越光中學和承天中學教書，以及在麗水抗日劇詠團工作時，她的經濟情況稍微轉好。[91] 但離開劇團後，范小梵的經

9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05-208。

91 因劇團的逐漸變質，團長和演員們輕薄、不自愛的生活，讓范小梵與胡剪虹不願意為這虛有其表的抗日宣傳隊繼續工作，於是選擇離開。

濟一度陷入絕境，甚至三餐不繼。

特別是范小梵轉到溫州的兩個月，生計格外艱困。當時，范小梵沒有工作，全靠胡剪虹在小學教書的微薄薪水，過著半飢餓的生活，雖然有時胡剪虹母親會匯給她二、三十元，但沒收到錢之前，她就得請在溫州郵局工作的戎鎮南接濟。[92] 戎鎮南其實與范小梵素昧平生，卻因爲范小梵曾在往麗水的車上幫助過生病的戎鎮南，此後，他們以姊弟相稱，范小梵去溫州就是戎鎮南的建議。[93] 而這種萍水相逢的友誼，在戰爭時期不時可見，也爲落魄的人們帶來生機。

令人好奇的是，在糧食不足的溫州，這位知識女性用何種辦法填飽肚子？據范小梵描述，她和胡剪虹常在校工的飯鍋邊放一只小蒲包，[94] 蒲包裡放一把米，因爲蒲包是漏水的，所以只是勉強把米煮開，煮出來的東西漲得像一顆顆小軟體動物，既不像粥、也不像飯；她們同時在飯鍋裡放一小把豇豆，煮熟後，用剪刀剪斷，再放點醬油，這對她們來說，算是最美味的食物；她們也用開水沖開當地盛產的廉價蝦皮，當做佐飯的湯。[95] 但後來溫州商人把米價從一元一斤漲到兩元一斤，困境加深，她們更無法溫飽，因爲起初還有一點米可吃，後來米店關門，她們只好吃菜葉和蘿蔔，而這些食物根本無法果腹。[96]

其實，爲了生存，飢不擇食的人無可數計，親友頗多的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15-116。

9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19-120。

9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16-117。

94 蒲包是用香蒲葉編成的裝東西的用具。

9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0。

9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0。

豐子愷也曾有這樣的經驗。豐子愷記得，有一天半夜，他們乘坐的船搖到拱宸橋，當時大家都很餓，但因爲無法立即上岸，只好在船艙找食物；由於艙裡只有飯，沒有菜，有人把枕頭打破，取出枕頭裡的熏豆，並用醬油拌熏豆，這居然成爲他們唯一的一道菜。[97]

然而，是否所有人都陷於三餐不繼、飢不擇食的情境？有一天，范小梵餓得心裡發慌，就乾脆出門到街上走走，她沿著五馬街往飯店走去，竟然讓她看到這一幕：

> 多少酒足飯飽的食客們從裡面走出來，臉上紅紅的打著飽嗝，噴出熏人的酒氣，或是悠閑地剔著牙齒，還有不少衣冠楚楚的人在往裡面走。我從櫥窗和開著的門裡，看見廳堂裡坐滿了人，桌上擺滿了熱氣騰騰的菜肴，很多人在吆三喝四地划拳、碰杯；我看見穿白衣的侍者來回穿梭似地上菜、撤盤子；我看見那些美酒在杯子邊冒泡，滿得往外流……。[98]

看著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她明白人們爲什麼會去偷、去搶；而儘管溫州不是後方，僅是處在前方的一個特殊位置上，她還是感受到抗戰期間流傳「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順口溜的意涵。[99]

失業、靠朋友接濟的飢餓日子，在范小梵到地政處當抄寫員和到張家當家庭教師的工作後，得到改善，特別是張家給的報酬，多過抄寫員的待遇，而且吃住都不用花錢，又不須擔心物價無止境的波動；這一年，她和胡剪虹在張家過了

---

97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04。

9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1。

9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0-121。

「流亡以來最爲像樣的除夕夜」。[100] 但從溫州淪陷、逃往鄉村到再度回到溫州後，百物昂貴，米居然賣到一元 7 兩，連富裕的張家也只能吃麥粉當糧食。[101] 不過，范小梵認爲，溫州的九個多月中，雖然曾經貧病交迫，這算是較好的一段，而且也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至於往後的日子則根本無法相比。[102]

這往後的生活又出現甚麼景況？1941 年 7 月上旬，范小梵離開溫州，與胡剪虹在麗水相會，范小梵丈夫的同學覃子豪建議她們先前往上饒，因爲那裡是東南抗戰指揮中心，機關單位較多，容易找工作。[103] 然而，漂泊到上饒，范小梵又失業了。范小梵回憶，這種處於貧困、苦惱又動彈不得的境地，讓她飽受折磨。[104] 覃子豪雖然常來看她，卻因爲他也貧困，只能給她幾塊錢或幾支蠟燭，范小梵在幾乎身無分文之下，連一個月兩元的房租都付不起。[105] 范小梵記得，有幾天她靠一天吃兩根油條和燒餅充飢，後來連一天的燒餅油條也維持不下去，她只好到表哥那裡混頓飯。[106] 這種窘境直到去古岩寺的廣播電臺上班後，才逐漸改善。

除了描述自己飢餓的窘境之外，范小梵是否也注意到其他人的生活？好比，一樣是知識分子的朋友或同事，他們的遭遇如何？又怎麼解決？根據范小梵的紀錄，她從電臺轉到

---

[10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8、131、133。
[10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1。
[10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1。
[10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4-161。
[10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65。
[10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66。
[10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66-168。

福建南平的師專教書時，那裡的生活極為簡樸，物資也相當缺乏，因此，大家除了對衣衫襤褸習以為常外，每天不管老師或學生，都不吃早餐，空腹教書或讀書。可嘆的是，食堂裡的廚工還偷扣包伙教師的糧食，這群文弱書生奈何不了他們，只好趁夜晚在小飯鋪買點豬油渣，又從農民那裡買棵洋白菜或花菜，自己煮來吃，對他們來說，這算是打「牙祭」。[107]

值得一提的，范小梵的例子告訴我們，失業與飢餓通常連帶而來，為了溫飽肚子，民眾東奔西走找工作，如果在平時，沒有太大的身分認同問題，但戰爭時期卻容易被冠上通敵等罪名，加上交錯在民眾生活中的政黨矛盾關係，竟讓這群汲汲營營的民眾，在不知不覺中誤闖各種紅線。除有名的女畫家李青萍曾先後被國民黨和共產黨污名化之外，[108] 即使是小老百姓也不可倖免。溫州失業期間的范小梵，就一度被懷疑是中共的間諜，當時有朋友特別提醒她要小心，並告訴她：

> 我知道有人在盯您，說您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人家說，您這麼好的學問，怎麼會沒有工作？[109]

因為失業被質疑，找到工作也一樣出現問題。在好不容易找到在上饒古岩寺電臺當播音員的工作後，范小梵萬萬沒料到不再餐風露宿的喜悅，卻在戰後換來長達三十多年的浩劫。該電臺是一個宣傳抗日的國民黨電臺，沒有政黨意識的范小梵，只是懷著一股熱情加入工作，卻在戰後被共產黨指控為

10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09-211。

108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133-189。

10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2。

上饒集中營的特務，而能證明她曾「參加反動黨團」的國民黨黨證和電臺委任狀，因爲丈夫的膽小、害怕而被燒毀，使全家在文革時期慘遭批鬥，范小梵更當了三十多年的「特嫌分子」。[110] 因此，范小梵很無奈地記著：「人生就是這麼滑稽，在國民黨時代，人家說我是共產黨的間諜，而解放後，又說我是國民黨的特務了。」[111]

我訪問戰時曾受中央政府政教合一訓練的余文秀，她和夫家所面臨的處境更加複雜。據她敘述，她的公公曾替第五戰區的李宗仁工作，後來回到家鄉安徽渦陽，不料身分暴露被捕，雖然日本人不曾傷害她公公，而是利用她公公，讓他在檢查處做商品報稅的工作，但她公公等同於漢奸。爲了營救她的公公，當時，他們曾住在新四軍盤據的老家渦陽，結果國民黨以爲他們投共，不願意接受他們；共產黨則認爲他們受過國民黨的訓練，也不容納他們。在走投無路之下，他們只得在僞政府管轄的宿縣做生意，一直到抗戰勝利。[112]

無論如何，處在貧病纏繞的日子裡，范小梵並沒有因此倒下，反而繼續逃難，找到讓自己暫時棲身的的地方。這都是來自許許多多人的援助，除了親戚朋友之外，還有逃亡期間所遇到的善心人士或難友等，有人與范小梵從素昧平生到莫逆之交，他們給予范小梵在求職、疾病或金錢上各種幫助，這不僅印證「出外靠朋友」這句俗話，也提醒我們注意近代中國人社會網絡關係的變化，特別是戰爭、災難打破人

110 范小梵，〈回望當年——翻閱舊日記所感〉、張曼菱，〈序〉，收入《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7、181。

11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2。

112 游鑑明訪問，陳千惠等紀錄，〈余文秀女士訪問紀錄〉，收入游鑑明、羅久蓉、瞿海源訪問，《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頁 132-134。

們原有的關係網絡時，另一種關係又取而代之。雖然這樣的關係只維持一天或短短數日，就不復存在，但也可能在他鄉再續前緣。

四、躲避空襲與翻山越嶺

（一）躲避空襲

日本侵華時期，躲避空襲是當時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特別在日機緊密轟炸的日子，有的人一天之內躲警報的次數往往不只一次。畫家豐子愷的自傳、日記、漫畫，就有不少躲空襲的驚恐回憶與畫面，范小梵也不遑多讓，對從來不曾遭遇戰爭的中國男女知識分子來說，這種經驗在他們生命中難以忘懷，有人從驚慌轉爲痲痺，也有人因此精神耗弱。[113]

范小梵回憶，1939 年，越光中學開學後不久，敵機就不停轟炸，她們經常天不亮就起床，往九里茅家埠的山樹林裡鑽；有時就在樹林裡上課、野餐，席地坐臥，直到太陽偏西才回城。[114] 利用躲空襲上課、讀書、野餐的情形，在當時相當普遍，因爲誰也不知道空襲何時結束，而累積多次空襲經驗的人們，乾脆找安全的地方躲避，也順便做點事，等警報結束再回去。和范小梵一樣，豐子愷在廣西宜山這段日子，幾乎天天逃警報，他對「空中殺人」實在無可奈何，也

113 張瑞德對重慶民眾躲警報的反應做了縝密分析，詳見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收入李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261-278。

11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76。

不想受躲空襲的委屈。有一天，和家人帶著書籍和點心入山，在岩洞裡讀書，逍遙了一整天，這一天，他們根本不知道有無警報。[115] 費孝通在昆明時，空襲警報一響起，他們就隨著人流去避難，在警報解除之前，他們一家人常藉此與朋友或西南聯大的老師聊天，有時也帶著書躲空襲。[116]

資料來源：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19。

115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47。

116　空襲警報下費孝通一家的日常生活，大致是：早餐過後，他妻子就開始燒飯，這樣他們可以在下午回家後熱一熱再吃。預行警報在十點左右響起，費太太熄滅爐火，家裡每個人就準備好「警報袋」。空襲警報一響，他們就加入人流，朝文化巷跑去，穿過城牆缺口處，繞過聯大校舍和英國花園，鑽進小山崗。易社強著，饒佳容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 310。

若是在白天逃警報，人們較容易找到掩護的地點，對空襲的畏懼感也相對較小，但換成是夜間，就格外緊張。這驚恐的場面全傳神地呈現在范小梵的日記裡，她寫著，1940 年暮春的一個晚上，她和團員們正在麗山教育廳的小舞臺排戲，忽然拉起警報，緊接著是緊急警報，當緊急警報還未停歇，飛機就跟著到來；大家只能各自找地方躲藏，因爲是晚上，又對位在山上的地形不熟，每個人都非常恐慌。[117]

當時，她和胡剪虹奔出側門，打算從通道的大門出去，不料，大門上了鎖，根本出不去，他們只好退回來，還沒等他們想好往哪裡出去時，飛機已飛到頭頂上方。慌亂中，大門外也有人想要進來，他們拚命搖晃鐵鎖，亂哄哄的奔跑腳步聲，夾雜著「喊聲、哭聲、喊爹的、喊娘的，加上孩子們的哭聲，簡直亂成一團，彷彿整個麗水城的人都出動了，彷彿要把麗水城抬起來一樣」。[118]

在進退兩難下，她們只好緊靠著牆腳蹲坐著，仰望天空；當天晚上，日軍出動 24 架飛機，來回轟炸這個城市長達數小時，警報解除時，已經天亮。[119] 沒想到的是，她們逃過一劫，奔回宿舍、打掃好床鋪後，才想睡一會兒時，忽然又拉警報，緊接著是緊急警報，跟夜晚一樣，飛機和警報幾乎是同時到達。[120] 因爲是白天，她們逃到一個風景優美的山岩邊，後來聽說那地方稱「三岩寺」，是汽油庫所在地。[121]

其實，許多中國人不曾出過遠門，戰爭讓他們必須離開

---

11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4。
11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4。
11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4-105。
12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5-106。
12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6-107。

家園，到處奔逃，他們對所到地區完全陌生，因此一旦碰上敵機來襲，根本無從選擇避難地點，難免誤闖險境。和范小梵一樣，豐子愷的家人在宜山躲空襲時，曾就近逃出東門，往樹木茂盛的地方避難，而東門外樹木茂盛的地方，卻是車站和軍事機關，他們居然都在轟炸的大目標裡躲警報。[122]

除了誤入險境外，范小梵和胡剪虹甚至直闖死人堆。例如，她們逃到福建南平時，當地經常拉警報，有一次，在緊急中，她們往一戶人家的門洞裡鑽躲。那時南平鬧鼠疫，大街小巷很多人家的門上，都貼著一張比門神小一點的白紙，白紙上畫著一個背後交叉放著兩根枯骨的骷髏，門口地上撒滿了石灰粉，表示這家人家鬧鼠疫死了人；但在敵機臨頭的那一刻，她們根本管不了石灰和骷髏的警示。[123]

而最恐怖的是，敵機低空掃射，飛機駕駛員直接與民眾打照面。在麗山躲空襲時，范小梵就遇到這樣的場景：

> 有一天黃昏，我們（指胡剪虹和她）正走在荒郊野外，一架敵機從我們身後追過來，而且幾乎是擦著樹梢地低飛著。我們趕緊靠在一堆荒墳的黃土邊，這時我抬頭看那架飛機，見它側著機翼，似乎要從我們身旁掠過，我清楚地看見那個飛機駕駛員，胖胖的黑方臉，戴一副眼鏡，正低頭獰笑著打量我們。然後，他一邊向前飛去，一邊掃了一陣機槍，那機槍發出的火星都看得清清楚楚。[124]

日機不定時來襲的情形，讓民眾每天生活在風聲鶴唳、草木

---

[122]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43。
[12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19。
[12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07。

皆兵的氛圍下，即使警報未響、敵機沒有擦身而過，人人都成爲驚弓之鳥。豐子愷回憶在宜山時，有次正逢趕集，其中一個紗布攤突然收起攤子，隔壁的地攤立即跟著收，不久之後全部的攤子都在收拾，有人還說：「警報來了！」大家都倉皇逃命；正在樓上觀看的豐子愷，也帶著小兒子下樓想逃命，剛出門，才知道是庸人自擾，根本沒有警報，而紗布攤之所以收攤，是另有他事要離開，卻引來一場烏龍。[125]

因此，空襲警報讓許多人精神耗弱，逃警報更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而且沒有階級、年齡、性別的區別。這些現象也普遍出現在第二次戰爭期間的歐洲國家，1940 年 9 月 7 日到 1941 年 5 月 10 日間，德國曾對英國倫敦等城市進行空襲，倫敦在德機的密集轟炸下，死傷不計其數，足見空襲所帶來的浩劫是沒有國界的。

（二）翻山越嶺

對當時許多文弱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平日多靠車代步，戰爭卻改變這一切，由於逃難的路線有水路也有山路，在車子難求的狀況下，不少人被迫必須步行，甚至翻山越嶺。豐子愷的日記記載，他的家離學校約有五里路，步行需要花費 35 分鐘，以往他一定乘坐黃包車；在桂林的時候，他開始安步當車，逃往貴州的路上，他就在懷遠、德勝的山區走了 90 里路。[126] 此外，在山路遭遇驚險的例子，更是無奇不有。好比，我曾訪問蔣介石的侍從官錢義芳，據他說，抗戰時護衛蔣介石到貴州花溪視察時，他只是小侍衛，爲維護蔣的安

125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43-244。
126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8、55、250。

全，被長官用防護皮帶扣在車上，雙腳則踩在車外踏板上，監視空中是否有敵機；在崎嶇不平的山路，帶子稍微鬆開，就會掉下去，他的驚慌可以想見。[127]

對於豐子愷與錢義芳的敘述，我深感同情，這是戰時男性的悲苦，但閱讀范小梵的日記，我發現在戰爭期間，女性的困苦不亞於男性，范小梵翻山越嶺的艱苦經驗，就遠超過他們。范小梵逃亡的路程因爲多在山區，步行、攀爬山區的時候很多，從她的敘述中，不斷看到女性驚人的毅力。

離開坡塘後，范小梵和胡剪虹的逃亡路線，從坡塘、平水、王壇、王城、谷來到嵊縣，一路上都是山路，讓她們料想不到的是，所謂「平水」，竟是一座相當高的山嶺，他們必須翻越平水嶺，才能走往目的地。喬木下的山路雜樹叢生，幸而是冬天，樹葉枯落了，還能循著鄉下人踩出來的小路逶迤盤旋；他們不知道走了多久，才爬到山下，又不知走了多少里路，才到了第一站王壇。[128]

在王壇休息一晚，次日一早再次動身，平水以南的山路，不再需要翻山越嶺，而且是可以行大車的大路。他們找一位挑夫幫忙挑行李，不料挑夫走不到一半路，就找藉口跑掉。[129] 她們只好自己背著行李走，范小梵描述當時走山路的經驗：

> 走長途路，我有一個體會，覺得走頭 30 里路，腳下生風似的，走得又快又不覺累；但是 30 里到 50 里這

---

127 游鑑明訪問，林杰民記錄，〈錢義芳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記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上篇，頁 351-352。

12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1。

12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2。

> 一段路，簡直累得不行，腳抬不起，腿不能打彎，恨不得坐下來、躺下來不走了；但到了 50 里以後，彷彿勁兒又來了，又能健步如飛了。[130]

幸而范小梵小時候經常爬山，[131] 在紹興教書的一年半，范小梵的生活和心情大為改善，身體也得到充分調養，才得以在一天內走七、八十里的山路。[132] 從紹興到嵊縣直線距離大約有一百多公里，她們是繞小道走山路，一直到第二天，元宵的朗月照滿山間時，才接近目的地。[133]

這種勇往直前行走的經驗，也出現在豐子愷的記憶中。有一天，豐子愷與友人同赴永福，原本想雇轎子，因為需要 6 元大洋，他決定省下這 6 大洋，步行到永福。[134] 這一趟，他們步行了 7 個小時，竟然不覺得疲憊。根據同行人的說法：「走路休息不宜坐下，下坐〔坐下〕則走時愈感吃力」。[135]

逃難到溫州，范小梵又一次體驗到翻山越嶺的危險。溫州北邊是多山地帶，是括蒼山與雁蕩山交互糾結的山區，幾乎所有的村鎮都在群山環抱之中，因此，范小梵和地政處的人就得備極辛苦地翻越群山峻嶺：

> 江南的春天是多雨的季節，尤其在山間，一下雨，對面二丈遠就什麼也看不見了，樹林、路徑全罩在雨霧裡。記得翻爬一座高山時，我也不知它有多高，不是

---

13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2。

131 范小梵家鄉的山不僅高且連綿不斷，她經常從這個山頭爬到另一個山頭。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0、68。

13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69、92。

13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2-93。

134 豐子愷，《教師日記》，28 年 1 月 19 日，頁 67。

135 豐子愷，《教師日記》，28 年 1 月 20 日，頁 68。

> 那種高而陡峭的山峰，而是漸漸高上去的長長的山嶺，山上樹林茂密，鬱鬱蔥蔥的，天氣好時都光線暗淡，下大雨時，幾乎就是對面不見人了。[136]

在風雨交錯中登山，最是危險。范小梵回憶穿著草鞋、帶著斗笠，與風雨搏鬥的驚恐一幕：

> 越到山上風越大，雨也跟著瓢潑似的劈頭蓋臉地打過來，頂著風上山，好難走呀！風吹得你簡直站不住腳，直想把你掀倒才好，這時，人只能盡量彎著腰，一手扯緊斗笠，一手攀著樹枝，一步半步地往上爬，那山路又那麼狹窄，在昏暗的雨霧中只勉強可以辨識，大雨澆得滿臉滿身地往下流，連抽出手來抹一下的機會都沒有，天上的雨往下瓢潑著，地上的水四處橫流，真是一步一步地淌著泥水，頂著逆風往前挪，稍一不小心，就會有滑倒的危險，甚至滾下山去。[137]

這次攀爬山嶺的艱苦經歷，讓范小梵到古岩寺的電臺上班，沒有負擔。古岩寺隱藏在高地的背後，山並不高，卻是又大又厚的岩石層。[138] 戰爭練就范小梵健步如飛，她很得意地說：「後來當記者時，很多男記者也跑不過我，常被我遠遠甩在後邊。」[139]

除了步行翻山越嶺之外，范小梵還曾乘車爬山。抗戰時期的電影或紀錄片，出現過疾駛火車頂上趴著難民的驚險萬狀鏡頭，但那些難民幾乎都是男人，而從被稱爲「七十二拐」

---

13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44-145。

13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46。

138 有人稱這座山為「苦岩」。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5。

13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5。

的晴隆、普安、盤縣一帶險峻山道，坐車西走的范小梵，她和胡剪虹當時的處境，與這群男人有無不同？她們面臨何種情景？又怎樣克服驚恐？

奔逃到貴陽後，范小梵和胡剪虹好不容易攔到一輛運棉花的過路車子，然後爬到了又鬆又軟的棉花堆上。由於棉花堆得很高，車在行駛中會碰到樹枝，如果來不及躲閃，隨時會被刮傷或掀下車；而車子一顛簸，更有掉下山崖的危險，兩人戰戰兢兢地趴在上面。[140] 11 月天，高山氣候非常寒冷，范小梵穿的舊絲棉袍，根本抵擋不住迎面而來的刺骨寒風，即使手凍得麻木，還得死命地抓著捆綁棉花包的繩索，所幸她們年輕、機靈，反應也快，竟然闖過了一道道鬼門關。[141]

在這「七十二拐」的山路上，車子是順著公路盤繞上山，而且連續拐彎，她們趴在車頂上俯看下面，是深不可測的萬丈深淵，半山腰裡到處看到翻車的汽車殘骸。下山後，再回望來途，簡直難以想像：

> 只見那繞山盤旋的公路，簡直像夏天熏蚊子的盤香一樣，白白的一圈一圈地盤繞在山上，其實我們整整一天都是在繞著這座山轉，像蝸牛一樣在這白色的圈圈上爬，直到天晚下山了，仍然是在這座山下，不過是換了另一邊的山腳吧。[142]

坦白說，范小梵的例子也發生在其他女性身上，只是透過范小梵的生動敘述，她翻山越嶺的經驗顯然比其他女性豐富。除了范小梵留下的這方面史料十分完整，當時許多知識女性

[14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1。
[14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1。
[14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2。

是跟隨學校、機關或家人跋涉過千山萬水，相較於群體的流亡，范小梵本人或她的同伴，則更爲艱苦。這其中有一個値得注意的現象是，從范小梵與胡剪虹攀爬山嶺的能耐，說明近代中國知識女性與傳統女性的身體有很大的不同。而這群新女性之所以能超越性別身體，與男性一樣翻山越嶺，清末以來，政府、學校、知識分子與媒體對女子體育的大力鼓吹，是不可漠視的催化劑。[143] 體能教育讓知識女性有機會在運動場中，展現肢體技能，也帶給她們力量，用身體挑戰各種崎嶇難行的路程，不因爲戰爭而平白犧牲。

五、苦中作樂

日本侵華的八年中，並不是全面占領，是逐步地攻城掠地。根據范小梵的觀察，日軍要侵占一個城市前，總是先用大砲、飛機和機槍來回輪番轟炸、掃射，隨後而來的就是大規模地侵占。[144] 因此，砲火聲與敵機沒有來到之前，人們過著與平日無異的生活，有的城市甚至還過著紙醉金迷的日子，這些情景全落在來自異鄉的范小梵眼中筆下。在范小梵的記述中，民眾到底如何苦中作樂？她自己又怎麼排遣苦悶生活？

（一）苦中作樂的老百姓

第一次逃到坡塘應家潭時，范小梵發現：「雖然是抗戰

143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23-194。

14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37。

期間，只要日本鬼子不打過江來，農民們還是照舊幹自己的事。」[145] 那時正逢隆冬，農村裡的家家戶戶都忙於過年的事，對農民來說，忙了一整年，當然得利用過年，熱鬧一番，大家還穿戴新衣、新帽，到親戚家串門子。[146] 而這種現象似乎頗爲普遍，1939 年初，演員陳波兒帶領「戰區兒童婦女考察團」到山西崞縣的村落考察，儘管當地離日軍駐地僅二十多里，日機有時會路過，但老百姓仍快樂過年、過元宵佳節，她忍不住寫道：「想不到在前線上，卻讓我們看到了這些——太平景象」。[147]

然而，在范小梵再度到坡塘避難的 1940 年年初，坡塘農民過年的歡愉景光就完全走樣，因爲到處傳著日軍即將渡江的流言，雖然快到元宵節，卻是人心惶惶：「戰亂年頭，甚麼節呀年呀的，誰也沒這份閒情和雅興。」[148]

當范小梵和胡剪虹逃到崇仁鎮時，更讓范小梵大吃一驚。因戰時生活顛沛流離，途經許多鄉鎮，她從來沒有見過「有如此豪華夜景的」。[149] 范小梵聽說當地人喜歡過夜生活，因此吃食的夜市如此興隆：

> 一條街上擺滿了吃食攤的燈光，宛然是一大串一大串璀璨的夜明珠，在這靜夜的長街上閃爍。……那燈光

---

14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49。

146 像是沖年糕、磨粉、做豆腐，還有宰殺牲畜、買香燭、縫新衣、做新鞋等過年大事，當地老百姓沒有免除。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43、49。

147 這是陳波兒在考察期間寫給《中國婦女》的信。〈晉西北巡禮：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通信之一〉，《中國婦女》，卷 1 期 1（1939 年 6 月），頁 8-9。

14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0。

14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3。

> 不僅像是群星，那誘人的撲鼻香氣更直透入你的五臟六腑。[150]

才從烽煙滾滾、砲聲隆隆的前線，來到這燈火輝煌、追歡達旦的昇平世界，讓范小梵萌生一種異樣的感覺，認爲抗戰時期不是每個人都有同仇敵愾的意識。[151]

這種「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感覺，在范小梵到有「小上海」之稱的溫州時，更是感受深刻，對人世間的不平也悄悄湧上心頭，如前面所提。[152] 當范小梵到達廣東，這種心情又再度浮現：

> 我在這裡所得的印象是：這裡的人們似乎不知抗戰為何事，大片國土淪為敵占區，多少人奔走呼號，多少人流離失所，多少人為抗戰浴血拚命，仿佛與這裡全不相干，他們照樣吃喝玩樂，簡直就是兩個世界兩重天。[153]

她稱這些人是「浮屍」，而自己也不得不在這些「浮屍」群中穿來走去。[154]

生活在苦悶的戰爭氛圍裡，娛樂是另一種「苦中作樂」，在人人自危的戰時，最感人的是自娛娛人。飽受貧困生活折磨的范小梵，便曾在短暫的安定生活中，透過舞臺表演、編導戲劇爲學生與民眾製造娛樂。1938 年年底，在越光中學教書的范小梵，和學生共度她有生以來的第一個聖誕節，並有

---

[15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3-94。
[15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94。
[15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20。
[15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27。
[15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27。

舞臺表演；[155] 隔年新年放寒假之前，全校師生又舉行了一場演出活動，其中有〈流亡三部曲〉的合唱與表演，范小梵還導演了一齣話劇〈漢奸的子孫〉。當時是抗戰的第二年，日機常來騷擾，因此演出的內容在揭櫫抗戰意義，范小梵也藉此教育學生，光靠祈禱上帝是不能擊退敵人的。[156]

雖然這類戲劇主要在宣傳抗日，卻也有舒緩緊張情緒的作用，有的百姓更當它是難得的娛樂表演。例如，范小梵參加的麗水歌詠團，曾在碧湖、大港頭、雲和與龍泉等地做抗日巡迴演出。有一次，歌詠團在雲和搭臺子演出，當地因為沒有敵機去轟炸，老百姓過著太平日子，難有同仇敵愾的感覺，但對小地方的百姓來說，看一場不用花錢的戲，十分難得，因此他們還是趕去湊熱鬧。[157]

范小梵和廣播電臺的同事撤退到福建建陽時，當時他們已經無法收新聞、貼戰報，為了替既無消息可知、又無娛樂可取的逃難百姓打氣，也給他們精神安慰，有個劇團導演找他們演戲，他們演了〈軟體動物〉的話劇，儘管那時范小梵罹患瘧疾，身體時好時壞，她還是被要求擔任主角。這場戲居然連演三天，每天高朋滿座。[158] 范小梵有感而發地表示，當時大家都被敵人逼到盡頭，能夠「有點娛樂，輕鬆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也算是為大家做了點貢獻」。[159]

苦中作樂的情形以校園最為普見。例如，延安的中國女子大學，在生活艱困的抗戰時期，會舉辦遊藝晚會，彼此聯

15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74。
15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74-75。
15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112。
15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204-205。
15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204-205。

歡，這是女學生最感興趣的集體活動。[160] 至於在昆明的西南聯大，除了社團活動、體育課程照舊之外，打橋牌、看電影都不曾或缺，學生還組織歌詠隊、劇團等，使流亡師生的生活有點趣味。[161] 其中，話劇演出深受學生喜愛，當時就讀復旦高中的重慶學生羅福慧表示，重慶原本流行川劇和京劇，話劇在抗戰期間引入重慶後，不僅是最受歡迎的休閒娛樂，且「成爲了一種政治和愛國主義宣傳的有力工具」，而她自己也非常著迷話劇與劇中的救國思想。[162] 無疑的，范小梵對演戲的關注，多少是出於觀眾的熱情，以及話劇有愛國教育的作用。

很明顯的，戰爭期間人們的消遣方式，與太平時期並沒有太大不同。只要敵機不來，有錢的人繼續沉迷在聲色場所，貧窮的人則是看戲打發時間，惟一的改變是，有些娛樂活動加入愛國意識。主導這些活動的，有不少來自淪陷區的流亡知識分子，就如范小梵一樣，他們既演又導，除了具有表演天賦，讓他們爲人製造娛樂，而讀書人的使命感，也讓他們願意在戰時創造出與一般人不同的娛樂情境。

（二）自我的苦中作樂

至於范小梵又如何鬆綁自己的壓力？和許多從不曾離開家鄉的民眾一樣，戰爭讓他們走過中國各大城鎮，也藉此得以飽覽各地的山光水色。身爲畫家的豐子愷對各種景色更

---

160 郭靖，〈女大概況〉，《中國婦女》，卷 1 期 2（1939 年 7 月），頁 11。

161 易社強著，饒佳容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 289-308。

162 李丹柯，《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頁 75。

有感覺，有一次，他給表姪徐一帆報平安的家書中，寫道：「此次流離來桂林，雖道途勞頓，但一路飽覽名山大川，可謂因禍得福」，不料，徐一帆把信交給《文匯報》，該報刊載這封家書後，其中「因禍得福」這幾四個字，竟引來一場論爭，有人批評豐子愷在戰時竟然有心情瀏覽風景。[163]

事實上，在驚險的逃難生活中，苦中作樂是許多人排遣苦悶生活的一種方式。前面提到的老舍，對流亡期間經過的灌縣、青城的美景，有不少著墨。[164] 我訪問過張王銘心女士，因爲來自富裕家庭，他們全家從湖北到四川時，是「包船」前往，沿途還爲了觀賞風景，在常德逗留一段日子。[165] 對當時流亡在外的人來說，如果不是戰爭，許多名勝古蹟只是別人的口述或書本上的記載，既然有機會來到當地，當然會藉機欣賞風光。

范小梵在艱苦的流離途中，也不時提到一些地方的典故或是描繪名勝古蹟。1938年戰爭才剛開始，日軍還沒有威脅紹興一帶，大家還有心情出遊，當地的風光水色、歷史古蹟讓范小梵流連忘返。[166] 有一次，范小梵與越光中學的學生同遊當地的香爐峰，他們徒步走了將近三十里路，然後攀登到山頂；原本范小梵只是遠眺該峰，而這趟遠足滿足范小梵的好奇：「我不止一次地凝望過它，凝望那上面飄過的白雲

---

163 豐子愷，《教師日記》，27年12月22日，頁53-54；盛興軍，《豐子愷年譜》（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頁312。

164 老舍，《老舍自傳》，頁167-173。

165 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紀錄，〈張王銘心女士訪問紀錄〉，頁72-77。

166 例如越光中學附近有不少歷史名人的足跡或歷史故事，沈園、與朱買臣、王羲之有關的潑水弄、汲水弄、躲婆弄、題扇橋，還有沈園與陸游詩中的羅漢橋。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71-72。

和籠罩著的暮靄，對這座山神往過」。[167] 范小梵對紹興人的馬桶文化雖然不敢恭維，但對在紹興坐船觀景的愜意生活，頗有感觸。當時她從城裡到胡剪虹任教的興浦小學，是乘船直達校門口，沿途看兩岸的田野、群鴨、水鳥，或是水中閃動的波光、雲影，都讓她陶醉；[168] 而這充滿詩情畫意的江南風光，在她心裡縈繞多年。[169]

往後，因爲日軍侵襲的範圍越來越大，轟炸的日子也不斷，在到處遷移流亡中，范小梵很少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但偶而在日記中會記述她所看到的景致。

藉觀景來紓解心情之外，喜歡詩歌文學的范小梵，在流離期間也不忘學習。由於高中畢業時，她的英語不及格，爲彌補這個缺憾，便利用在越光中學教書之餘學習外文。她曾借來英國詩選和拜倫全集閱讀，好學的精神感動了校長，慨然把拜倫全集送給范小梵。[170] 范小梵逃難期間，始終書不離身，即使衣物丟光，這本書總不捨得丟棄；直到中共建國前夕，因爲在昆明窮困到無法生存，她才賣書換糧食。[171] 對知識分子來說，書本是無價的文化財富，這一點從范小梵身上清楚的折射。范小梵自學英文的態度，並沒有受戰爭影響，除了學會與洋人打交道的「洋涇濱」英語，在張家當家教時，也不斷自修英文，從「讀、查字典、造句、做練習」，到請朋友修改英文信，最後甚至能翻譯英文劇本。[172]

---

[16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68-69。

[16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78-79。

[16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72。

[17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70。

[17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70。

[172]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30-131、

另外，能讓范小梵苦中作樂的是，透過寫日記把抗戰時期的遭遇、苦悶，如實記錄。而與家人、朋友通信，也是排遣鬱悶的方式，在烽火連天下，能收到經過多少轉折的信，對她是「心靈的唯一的甘泉」；[173] 特別是給丈夫寫信、寄信，成為范小梵最大的寄託，也是她的精神支柱。當歐洲也處在砲火不斷、郵路中斷的時候，范小梵萬里跋涉到西南地區，就是期盼在大後方收到丈夫的隻字片語。[174] 這種閨中怨婦的心情雖然平常也可能發生，戰時卻更顯情傷。唐肅宗至德二年(757)3 月，杜甫寫下膾炙人口的〈春望〉，其中：「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的意境，與范小梵的感觸相互輝映，似也說明戰爭時期渴望與家人互通音訊的心境，沒有時代也沒有性別區隔。

其實，戰爭期間夫妻分居兩地，常使家庭陷入破碎，離婚、重婚或另組家庭的情形，處處可見。[175] 范小梵透過書信、日記思戀丈夫，也理智拒絕了四位愛慕者的追求，免於婚姻破碎。[176] 據她後來的回憶：

> 在那等待、期望、苦難、流亡的歲月裡，他確實是我精神上的寄託和力量。多少個青年含情的淚眼，多少

204。

[173]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42。

[174]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48-249。

[175]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97-121；張玉法，〈戰爭對中國婦女的影響(1937-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7，頁 172-173。。

[176] 包括一位學生趙作鋅與三位朋友覃漢川、吳穎瑞、劉國梁。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84-88、190-194、228-232、264-266。

> 人對我真誠的傾心和仰慕，我都明智地處理了——或者是被我說服成了朋友，或者是背負著一顆創痛的心離開了。[177]

曾是《詩頁》成員的覃漢川，不只一次地爲范小梵抱屈：「你不應該這樣消耗你的青春！」「有一天，你會惋惜後悔的！」[178] 甚至還說：「你爲朱顏這樣苛刻自己，讓青春歲月無情的消逝，即使有一天朱顏回來了，他會爲此而感謝你麼？」[179] 但范小梵內心卻理性的吶喊著：

> 多少年來，我就是這麼我行我素地闖過來了。對於愛慕我的人，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有的是在偶然間覺察到的。親愛的朋友們，你們的愛是純潔的、可貴的，但請原諒我吧，我的心已永遠屬於顏顏了！[180]

范小梵的自我苦中作樂，有不少地方呈顯知識分子的特質，好比從山川水色尋找歷史淵源、地理特色，或是透過讀書、學習增長知識，彌補戰時失學的遺憾；此外，寫日記、與丈夫或朋友通信，在一般小老百姓的生活中是不常見的。

六、代結論：超越性別藩籬

八年抗戰期間，豐子愷一家人經過六個省、十多個縣市、一百多個碼頭，包括杭州、桐廬、蘭溪、徽州、常山、上饒、南昌、新喻、萍鄉、湘潭、長沙、漢口、桂林、宜山、

17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178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179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93。
180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72。

都勻、遵義、重慶等地，最後落腳沙坪壩。范小梵也走過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七個省份，曾在杭州、坡塘、紹興、平水、王壇、王城、谷來、崇仁、嵊縣、永康、麗水、碧湖、大港頭、雲和、龍泉、溫州、龍游、上饒、崇安、建陽、曲江、桂林、柳州、金城江、南丹、獨山、都勻、貴陽、昆明等 29 座城鎮居住或過境。和豐子愷相較，年輕而沒有家眷相伴的范小梵，她的境遇更加坎坷，她的戰時生活圖景，是在遷徙流離中展開，不但居無定所，工作與三餐也時斷時續。

除了與婆婆、小叔曾一起短暫生活之外，范小梵絕大多數是在失業、貧窮、飢餓、賒債、疾病、空襲、逃亡交錯中自力更生，戰前她為追求自主婚姻而私奔，與娘家斷絕關係；戰爭時期，她為了找回自己的「人格、人性與自尊」，在矛盾中離開了婆家。[181] 嚴格來說，范小梵沒有在漫長的艱苦歲月被擊倒，這固然與范小梵不願被束縛又相當執著的性格有關，但如果范小梵不曾受過教育，也不具表演與演說的才能，是不太可能度過無數難關的。

從前面的勾勒，我們看到范小梵克服難關的過程，完全超越性別藩籬，甚至更勝男性一籌，無論是翻山越嶺或躲避空襲，她都能咬緊牙關、機智面對，即使面臨失業、窮困或疾病，也設法求助親友或暫時賒債，不因此放棄生存的每一刻。而女性堅毅的表現在戰時處處可見，史學家許倬雲回憶中日戰爭的逃難過程時，曾提及他母親勇敢的一面：

> 有一回，我們又撤退了，在一隻長江輪船的邊上，我們搭了一支小木划轉駁上大船，日本飛機在一次又一

---

[181]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58-59。

次的呼嘯著掃射甲板上的平民及四週蟻附著的小划子。到現在，我還記得她在江風中披散了頭髮，把小孩一個個由小划子推進大船的船艙。大船正在行駛，小划子和大船之間唯一的聯繫只是一支竹篙，她那時大概只想著把子女送到比較安全的大船而已。她剛登輪，竟發現凌弟不見了，即刻又衝進人叢，船頭船尾尋找，把哭泣著的弟弟從另一層甲板找回來。大家坐定了，她又找來一壺開水，讓每個人都喝一口，但是她自己竟沒有分到一些餘潤。[182]

而豐子愷也發現，與家人從長沙到桂林長達 550 公里的車程中，許多人都被車子顛簸得七葷八素；向來有頻尿習慣、一聞到臭氣就發痧的高齡岳母，以及有孕在身的妻子，一路上竟然都安然無恙。[183] 這些來自男性的戰時觀察，說明「男強女弱」的性別區隔，因爲戰爭更加不復存在。

戰爭改變人們的社會網絡，從前的人以家族、師生爲關係紐帶，這時期與素昧生平的過客都可以建立朋友關係，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境下，拉近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情感。好比，豐子愷在桐廬結了不少人緣，他形容「『逃難』把重門深院統統打開，使深居簡出的人統統出門」，也因此，這群人得以在窮鄉僻壤相會，以致於談天論道成爲這群知識分子流離期間生活的一部分。[184]

最重要的是，新的社會網絡沒有性別區隔，范小梵可以和女性朋友建立「姊妹情誼」，也能與男性朋友達成「君子

---

[182] 許倬雲，《心路歷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44。
[183]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36-237。
[184]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頁 218-220。

之交」。不過，對年輕又與丈夫只有半年婚姻關係的范小梵來說，她能在流亡期間理性拒絕愛慕者，相當不容易。撇開兩情相悅不論，在戰爭期間，不僅「男女七歲不同席」的觀念被打破，男女社交平等的現象，更在這段時期發揮至高點。

然而，性別差異或性別歧視並沒有因爲戰爭而消逝。戰爭期間，爲了防範日本軍隊和不肖男子，范小梵與她的女伴在住宿的選擇與安全考量上，比男性更加需要謹愼小心。除了住處問題之外，流亡在外的單身女性無論在戶外或工作場域，都有遭到男性覬覦的可能。在溫州街頭、廣播電臺辦公室，范小梵曾遇到意圖輕薄的男子，幸而都被她阻擋。[185] 范小梵不僅自我保護，也保護她的女伴。前面提到，范小梵爲了黃援華，與廣播電臺沙文男性長官爭執，是其中一個例證。而這種乘人之危的行爲，在戰爭的八年內，不時出現在范小梵和她的女伴生活中。其實，因生活空間而產生的性別差異與性別歧視，在平時並不罕見，但戰時更爲顯著。

女性不容易超越性別界限的，還包括已婚女性與婆家的關係。范小梵的丈夫出國之後，理應由她這個長嫂負起重任，不過，范小梵雖然努力操持家務，卻因爲不事生產，被婆婆當成是「白嚼食」的人，最後她在掙扎中離開婆家，把婆婆、小叔留在淪陷區，並託付給胡剪虹的家人。從某個角度來看，范小梵似乎沒有盡到媳婦的責任，相對於豐子愷還帶著十數名家中老弱婦孺同行，她顯得有點絕情；不過，就另一方面來說，范小梵之所以離開，是希望減輕婆婆生活的

[185] 在溫州街頭，范小梵用手肘猛撞意圖不軌的路人，並厲聲責罵；在電臺則以語言諷刺，停止男性同事的輕薄。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18、179。

負擔，同時，也希望藉外出工作的收入，支援婆家，甚至幫助小叔求學。[186] 范小梵乍似無情卻有情的矛盾心情，不時出現在日記中，從她準備往湖南逃難時的心情，即可見一斑：

> 但是去湖南，有許多問題仍然使自己很苦惱，第一件是紹興老人和良弟的問題，他們在敵戰區，我覺得自己既不能回去照料他們，如今又要離的〔得〕更遠，感到有負顏顏所托，不知將來是否能得到他的諒解，……而且，萬里之外的他，又怎能知道我們當時的處境？又能出什麼主意呢？那麼，一切只好自己拿主張了，別人諒解也好，誤解也罷，反正自己於心無愧就是了。[187]

從此處，或可說明在「知識女性」這個新群體產生之後，家已無法束縛女性，逃離家庭外出工作或拒絕婚姻的知識女性越來越多，而戰爭更促使她們走出家庭。也因此，范小梵雖然不捨，還是從婆家出走，跨越了性別藩籬。

---

[186]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271。

[187]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頁 152-153。

徵引書目

一、專書

李丹柯，《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易社強著，饒佳容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新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

孫豔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二、論文

〈晉西北巡禮：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通信之一〉，《中國婦女》，卷 1 期 1，1939 年 6 月，頁 8-11。

王正華，〈關山萬里情——家書中的戰時生活(1937-1945)〉，《國史館學術集刊》，期 17，2008 年 9 月，頁 87-128。

呂芳上，〈另一種「僞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97-121。

林玫儀，〈卷葹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晚清女作家左

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收入「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卷 20 期 2，2010 年 6 月，頁 121-141。

張玉法，〈新文化運動時期對中國家庭問題的討論，1915-1923〉，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901-919。

張玉法，〈戰爭對中國婦女的影響(1937-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7，2009 年 12 月，頁 157-174。

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收入李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261-278。

郭靖，〈女大概況〉，《中國婦女》，卷 1 期 2，1939 年 7 月，頁 5-12。

游鑑明，〈改寫人生之外：從三位女性的口述戰爭經驗說起〉，《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27-154。

游鑑明，〈受益者か、それとも被害者か——第二次世界大戦時期の台湾人女性(1937-1945)〉，收入早川紀代主編，《戦争・暴力と女性 3》，《植民地と戦争責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 78-100。

Zurndorfer, Harriet T. “War and the Silent Women: The Retrieval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Jewish Women’s Narratives of World War II.”《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7，2009 年 12 月，頁 107-155。

三、口述訪問紀錄、回憶錄、自傳、日記

王鼎鈞，《昨天的雲——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一》。臺北：爾雅書房，2005。

老舍，《老舍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范小梵，《風雨流亡路：一位知識女性的抗戰經歷》。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

許倬雲，《心路歷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游鑑明訪問，林杰民記錄，〈錢義芳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黃克武等訪問、周維朋等記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上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345-435。

游鑑明訪問，陳千惠等紀錄，〈余文秀女士訪問紀錄〉，收入游鑑明、羅久蓉、瞿海源訪問，《烽火歲月下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115-152。

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紀錄，〈張王銘心女士訪問紀錄〉，收入《烽火歲月下中國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61-113。

熊秉眞訪問，鄭麗榕紀錄，《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豐子愷，《教師日記》。重慶：萬光書局，1940。

豐子愷，《豐子愷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瓊瑤，《我的故事》。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9。

四、辭典、年譜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盛興軍，《豐子愷年譜》。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

Home is Nowhere, Home is Everywhere: A Female Intellectual's Life in Sino-Japanese Wartime

Chien-ming Yu*

Abstract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rought great calamity and hardships, and became a common memory for many Chinese people. In order to present a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women's wartime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a lesser-known memoir of a female intellectual, Fan Xiaofan's *Fengyu liuwang lu: yi wei zhishi nüxing de kangzhan jingli* (A Life in Exile: A Female Intellectual's Experienc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memoir consists of a compilation of diary entries. Although it may suffer from the inevitable overlapping of time and space, it provides a more realistic view of the mood and feeling of the author when she was writing the dairy. This special feature distinguishes this text from many other textualizations of memories. This article traces how Fan's memoir shows the war influenced the life of the newlywed Fan Xiaofan. As a female intellectual, how did she face various changes during the war? How did her experiences differ from men's? Or, did the war experience transcend gender differenc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not only briefly compares Fan's experiences with other female intellectuals' wartime memories, it also brings in some wartime memories of mal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ome, female intellectual, wartime, Fan Xiaofan